



从《清华周刊》发现中国

○胡一峰（2002级硕，人文）

110年前，清华学堂建立。在这百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经历了风雨沧桑的历史，积淀了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奉献的杰出人才。这其中，《清华周刊》作为一份不可或缺刊物，见证和记录着清华大学的早期历史。

《清华周刊》创刊于1914年3月24日，是一份由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原名《清华周报》，1914年9月22日改名为《清华周刊》。改办大学后，《清华周刊》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刊物，由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委员负责组织编辑出版。1947年9月25日被列为禁刊，停止发行。内容有言论、译丛、文苑及校闻等。该刊承载了清华23年的历史（其中1937年1月—1947年1月停刊），是清华大学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之一，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社会思潮史、学生运动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裨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从一场关于梁启超的争论谈起

1923年10月，梁启超应邀到清华演讲。此时的梁启超已到知天命之年，逐渐走出政治的聚光灯，向一个文化学者转型。但他要到校演讲的消息，还是让清华学子兴奋不已。一位学生写了《欢迎梁任公先生》一文，表达对作为“国学讲师”的梁启超之敬意与欢迎。不料，梁启超演

讲结束后，另一位清华学生却大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认为梁启超的演讲充满了对革命党人的政治偏见，“梁先生既不痛斥北洋派的流毒，复不痛骂研究、政学等各系的播弄，又不痛惜人民程度的低浅，更不痛咒外国侵略主义的煽动，而独责备主义始终如一、流血不知多少的革命党不应暗杀、行刺、运动军队”，并提醒同学们切不可因为梁先生发表政治偏见而不去听他的学术演讲，但也切不可因为梁先生发表政治偏见而完全信他的见解。

第一位同学名叫梅汝璈，听完梁启超演讲的第二年，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7年后，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他当时所穿的法袍今天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之中。第二位同学叫王造时，是梅汝璈的江西老乡，比梅汝璈年长一岁，入学却比梅汝璈晚了一年。后来他就读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并获博士学位，还在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研究员。1936年，因为呼吁抗日救国，王造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梅汝璈与王造时的这两篇文章刊发在同一本刊物——《清华周刊》上。这虽然是一本学生刊物，影响却飞出清华园。王造时批评梁启超的文章，被《时言报》和《顺天时报》转载，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

□ 史料一页

在《清华周刊》这本刊物上，我们可以读到近现代中国特别是文化领域的许多大事，还可以看到许多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行程的重要人物的“青葱岁月”。比如，1923年胡适与梁启超的“国学书目”之争的重要文献就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第一篇文章——张君勱的《人生观》也发表在《清华周刊》。清华大学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一百多年来，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中，几乎都活跃着清华学子的身影。可以说，欲了解今日之中国，不可不读清华之历史；要了解清华，又不可不读《清华周刊》。202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影印版《清华周刊》，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本“神奇”的刊物提供了便利。

“史的意义”非同寻常

1926年，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读书的姚名达在《〈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一文中这样写道：“《清华周刊》实负有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我叫他‘史的使命’”，“《清华周刊》不是游艺园的剧本，不是大公司的广告，更不

是捏造新闻的晚报，也不是有闻必录的日报；《清华周刊》实在是记载清华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留给落笔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看的，使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知道这秒钟以前的我们。《清华周刊》的执笔者，应该具有史家的眼光，怀抱史家的态度，去记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清华有意义的人生，全部活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赍续无穷，使清华的史，昭垂万古。”今天，距离姚名达撰文已过去了85年，我们重读《清华周刊》，首先感受到的还是其“史的意义”。

正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1914年3月24日，《清华周刊》创办之时，样式为寻常小报，第一期共4张，分为言论、纪录、校闻、校声、清华阳秋、警钟、文苑等栏目，当时名为《清华周报》，从9月22日第13期改为《清华周刊》。从1914年至1937年1月，《清华周刊》共出版636期。1947年2月《清华周刊》复刊，共出17期。此外，还不定期出版了一些增刊和特刊。1947年9月25日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刊，停止发行。从时间上看，《清华周刊》存在23年（1914年至1937年，1947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23年只是沧海一粟。但在清华校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这23年却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清华周刊》本是一张清华学生编辑的小报，发行范围限于校内师生，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它与《时事类编》《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100余家刊物进行交换，几乎每



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周刊》

天都收到多家国内各图书馆函请赠阅收藏的信息。举凡清华学制变迁、校园建设、办学经费，以及教学情况、学生生活，《清华周刊》巨细兼收，从而勾勒出老清华的生动剪影，也成为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教育、文化、思想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

以学生运动为例，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谓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两次学生运动，不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是现当代中国政学两界“大人物”的摇篮。学者欧阳军喜发现，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周刊》曾刊登清华学生代表团日货调查股的《日货调查一览》，列出药品类日货179种。清华学生代表团还发行《清华周刊》“号外”，每日出版两次。上午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及本校消息，下午为各报摘录的紧要新闻，由同学誊写两份，分贴在高等科、中等科食堂前面。这成为清华学生关于运动消息的主要来源，也为学生采取下一步行动提供了主要依据。而在“一二·九”运动前夕，《清华周刊》发文批评丁文江对日“低调”的言论犯了“严重错误”，并认为“今后中国的出路，不是屈服，而是斗争”。“一二·九”运动中的进步学生领袖蒋南翔、姚依林等人，都担任过《清华周刊》的编辑或撰稿人，蒋南翔更曾任总编辑。《清华周刊》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说到清华的进步学生活动，不能不提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他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担任清华第一个进步社团——“唯真学会”的会长，还曾担任清华学生会会长。1927年3月，他在美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1930年回国工作。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

牲，年仅34岁。《清华周刊》是记录施滉烈士的事迹和思想的重要文献。1924年，《清华周刊》上有一篇《见孙中山先生记》，生动记录了施滉、徐永煊、何永吉三人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的情形。施滉对孙中山说：“我们暑假后便要到美国升学，请大元帅指教我们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孙中山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又说，“以前求学，美国最好，因为美国比较谋的是多数人的幸福。现在则不然，比较上谋多数的幸福的，乃是俄国。”并谆谆告诫，“诸君要到美国念书，极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带坏。”《清华周刊》还刊载了多篇施滉的文章。在《学生对于社会应该怎么样？》中，他写道，“学生应该为社会谋幸福”。在《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言》中，他提出，清华之使命有二，一是“对于国家为解决国家问题”，二是“对于世界为介绍中西文化”。还认为，清华虽是留美预备学校，但不可把教育目标定在培养学生入美国大学，相反，“务必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不可仅以造就能够应付美国社会的学生为满足”。他还感慨道：“这四五十年中国是危险的，纷乱的，污浊的，清华人才应该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并奋斗。”平实的话语，让我们读到了一个清华人的自我期许。

《清华周刊》的编辑和作者群覆盖广泛，除了革命者，还有一大批文化名家。王瑶曾说，40年代各大学名教授中的清华校友，“差不多都当过各栏编辑”，就以

□ 史料一页

清华本校而论，社会学家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文学家闻一多，哲学家贺麟均曾在《清华周刊》效力。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的梁实秋，在《忆清华》中写道：“说起《清华周刊》，那是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周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写，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这段文字可与总编辑吴景超的回忆相印证：“这一年的编辑生活，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当时与我共同编辑《周刊》的人，最重要的，是一樵（顾毓琇）和实秋。我们那年住在‘新大楼’，便是现在的一院，三人共住一间寝室，课余时间，大部分便用在《周刊》上面，因为当时我们真把《周刊》当作一种有兴味的事业而合作的。一樵的主要职务，好像是编辑新闻，我与实秋，专写社论。每当发稿的前夕，我们大家商量几个题目，把意思交换一下，然后各人分开去动笔，在熄灯之先，假如还有工夫，每人也许再写一篇。写完之后，交换阅读，互相欣赏，自己便觉得真有了当大主笔的快乐。”

诚然，青少年时期往往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是筑就一生志业的关键时

期。据笔者所见，《清华周刊》上许多作者署了笔名，详加考证是一项极有意义而又极其艰巨的工作，或许我们已经很难对这个群体究竟包括哪些人一一落实，但这个群体生逢民族大变局的时代，作为“执笔之士”，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他们通过《清华周刊》留下的这份宝贵资料，不但让我们听到民族曲折前行的坚定足音，而且告诉我们，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学问、思考国运、砥砺人生。

清华文化与精神的导览图

曾经的《清华周刊》编辑、后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的浦薛凤说，《清华周刊》应该灌输新思潮、新学术，讨论新思潮、新学术，创造新思潮、新学术。在今人眼中，清华以及清华人以踏实、内敛的形象著称。然而，踏实不等于迟滞，内敛也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清华在新文化的传播和输入中，从未缺席。

笔者曾以《清华周刊》为基本史料，梳理过话剧在中国的早期发展。话剧是舶来的艺术，深受清华师生喜爱。从1913年起，以年级为单位，清华学生在圣诞节、除夕、新年等节庆期间经常举行丰富多彩的话剧演出。据统计，仅1913—1920年，清华有记载的演剧达到77次。演出最多的1914年，从年初演到6月，年底又大演一番，全年共演了19场。我们熟悉的“清华名人”如曹禺、吴宓、闻一多、汤用彤、吴文藻等，都曾登上清华的话剧舞台。而对于清华话剧的创作演出情况，记载最丰富的正是《清华周刊》。更重要的是，

《清华周刊》上刊发不少话剧理论评论文章。比如，1917年，《清华周刊》上出现了第一篇专论话剧的文章。文中说：

“学生演剧如其情节果风雅动人，有关世道，其习练纯熟精密，布景周到完美，多大纯而少小疵，则不特演者得增进阅历，引起刻苦勤劳之精神，悟分工合作之要，即观者亦受无穷之感化矣。”“夫学生之所短者，在经验之浅薄，而演剧能补助之。学生之所以见轻于社会者，乃少刻苦勤劳之精神，而演剧能贯注之。学生之所以大抵落魄无聊者，乃傲慢自大，无服从之自觉，与协同之精神，而演剧亦能挽回而矫正之。”因此，学生参加话剧活动，“实亦一种优良之实验教育也”。应该说，这篇文章透露出当时清华人的话剧观是十分先进的，他们重视话剧的美育价值，把话剧视为人格养成的手段。这些当年的“话剧粉”还借助《清华周刊》的平台，翻译了不少国外的话剧作品和理论著述，比如专文介绍Isaac Goldberg Kidd所著*The Drama of Transition*, K. Mac Gowan & R. E. Jones Harcourt所著*Continental Stagecarff*。德国的豪普特曼、巴塞尔曼，英国的狄更斯、萧伯纳，包括日本的菊池宽，也都在《清华周刊》上“混了个脸熟”。而清华话剧人放眼世界，目的是推动本土戏剧发展。1936年，《清华周刊》一篇文章明确提出“编译戏剧辞典”的倡议。文中说，中文方面理化、哲学、教育等学科有专门的辞典，“戏剧就始终没有”，“我们所需要的戏剧辞典，当然不是一种Dictionary，而是一部Encyclopedia，应包括作品与作家，舞台技术，作剧用语，史源等之东西”。还充满期盼地说：“希望几年之后写中国文章

时，可以不用外国的注脚。”这显示出很实际的话剧艺术本土化自觉和努力。

近些年来，文化文艺史领域的研究者，已经以各自的研究证明了《清华周刊》的价值。比如，李道新的《“有害”甚或“有罪”：1920年前后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一文，依据《清华周刊》，细致介绍和分析了1920年代闻一多等清华学生围绕“电影问题”的一场论战，以及他们关于电影的本质、公共言论、社会责任、学生自治等的看法。李道新认为，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是1920年前后中国电影传播史上颇有特点的案例。这场关于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论战，既显现20年代清华学校对学生自治及言论自由的追寻，又可称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并颇有成效的学术争鸣，还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进一步阐发的公共文化事件。再如，任勇胜的《“清华园里好读书”》独辟蹊径，对《清华周刊》的“书评”作了系统梳理，发现《清华周刊》共刊登过书评650多篇，约120万字，涉及十多个学科，1160多种书籍、刊物和文章，“这在同类刊物中是少见的，除了《清华周刊》编辑人员自觉地承继延续外，与周刊比较强烈的学术化意识和传播知识、构建高水平的校园文化追求是分不开的”。又如肖伊绯的《怎么样做艺术家》，发掘出1926年徐志摩在清华所作《文学与美术》的演讲；王兴的《作为〈清华周刊〉编者和作者的夏鼐》详述了夏鼐与《清华周刊》的文字交往，这两篇文章不但提供了文化史新知，而且开辟了从文献考订补遗和学人成长的角度利用和研究《清华周刊》的新思路。

据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统计，近20年

□ 史料一页

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清华周刊》为参考文献的学术文章高达2500余篇，其中博硕士论文占比为28%，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这充分说明，《清华周刊》是一座富矿，具有充沛的学术生命力。我们不妨把《清华周刊》当作一部上

乘的“史书”，也不妨将其视为进入清华精神的导引。由此进入，顺着历史的逻辑，发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价值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

（转自“藏书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8月18日）

杏坛传奇——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

○黄加佳

1925年9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这一年，对清华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因为清华正经历着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渡期，清华出现了一个既不属于留美预备班，也不属于大学部的学术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原本是相对“西学”而言。五四前后，一方面人们对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继承、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进而重拾文化自信，重新定义自己的呼声也应运而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立了。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仅4年，培养的学生也不过七八十人，但云集了当时学问最好、声望最隆的四位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并不是传统上那类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掌握现代学术方法，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不但为后世学人开拓了一个更广阔视野和研究维度，也成就了一个流传近百年的学术传奇。

“一番大整顿计划”

1922年3月，《清华周刊》登了一则名为《校长派定》的简讯：“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王文显先生代理副校长，已见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闻此次来掌斯校，有一番大整顿计划……”

彼时，正是清华校长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自从1918年对学校贡献颇多的周诒春校长遭人构陷离职以后，短短几年，清华已经换了三任校长，其中一位甚至还没到任就被学生拒之校外。

因此，当曹云祥被任命为校长时，全



清华大学校园内矗立的四大导师塑像